

接着又在杀死秦尉之后斥秦暴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的口号,从而发动了大泽乡反秦起义。王莽代汉之前则“折节力行,以要名誉”(《汉书·王莽传》),在堕落腐败的西汉政权中独树一帜,以至于全国吏民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二人上书要求其受禅代汉<sup>[12]</sup>。可见,政治传播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更迭王朝之历史无不伴有舆论制造之行为。这种舆论制造是一种以动员社会为目的政治传播。这种政治传播与其他以维护政治统治为目标的政治传播活动一起构成了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政治传播体系,维系和推动了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

综上所述,政治传播在中国古代政治的各个环节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政治传播的概念虽起源于现代西方,但其实践却遍布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各国政治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同样,各国的政治传播也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必须将其置于特定国家的政治历史环境中才能被深刻理解。因此,中国有理由也有必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而丰富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实践无疑能为这种理论的建构乃至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应当受到我们的高度重视。

## 参考文献:

- [1] 杨光斌. 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7.
- [2] [德] 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70.
- [3] [美] 阿尔蒙德,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策略[M]. 曹沛霖,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26.
- [4] [英] 芬纳. 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G]//统治史:卷一. 马百亮,王震,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89.
- [5] 葛荃. 教化之道: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化路径析论[G]//江荣海. 传统的拷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90.
- [6]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44.
- [7] [加] 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8] 孙旭培. 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25.
- [9] 潘祥辉. 官僚科层制与秦汉帝国的政治传播[J]. 社会科学论坛,2010,(21).
- [10] 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2.
- [11] [英] 罗素. 权力论:新社会分析[M]. 吴友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97.
- [12] 钱穆. 国史大纲: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6:152.

[责任编辑:张莲英]

# 民族国家间差异性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制约

## ——以政治价值观与民族文化为讨论基点

李彦冰

(北京联合大学 新闻与传播系,北京 100191)

**摘要:**民族国家间差异性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制约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和民族文化的不同与国家形象的关系最为密切。从全球的政治现实看,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是一个全球性宰制话语,在这一话语下,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塑造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首先作用于人的认知系统,通过改变认知影响人的态度,进而改变人的行动;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所带来的认知和交流的障碍会对国家形象产生重要制约和影响;刻板印象和民族文化偏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关键词:**民族国家;国家形象;政治价值观;民族文化;刻板印象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3)02-0033-03

收稿日期:2012-12-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11&ZD075)

作者简介:李彦冰(1980—),男,河南濮阳人,讲师,传播学博士,从事政治传播研究。

当前国家形象传播与塑造的研究是一个学术热点。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成因分析是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中心。纵观这些研究,大多将中国国家形象的成因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内部因素,即国家理念及其这种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国家建设实践存在问题;二是外部结构性因素,即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对国家形象的制约。尽管上述探讨一个是从微观(国家内部)考察,一个是从宏观(世界体系)切入;但是独独缺乏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宏观考察。因此,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对国家形象进行中观考察很有必要。

民族国家间差异指的是民族国家之间在同一维度上所存在的不同和差别。这体现在诸多方面,如地理位置、历史传统、阶级矛盾的激烈程度、政治价值观、民族文化等。相较于国家理念和国家建设实践的决定因素而言,民族国家间的差异性是国家形象传播与塑造的重要制约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政治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对国家形象传播与塑造的影响最为突出。

## 一、政治价值观差异与国家形象

政治价值观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所持有的一般规范、标准、意义和观念。它作为一种规范,在理论上为现实的政治行为提供指导;它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可以评判现实的政治行为的价值取向;它作为一种意义,是政治生活中人们追求的目标,具有理想性;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观念,深刻影响着一般民众的政治行为和国家的政治实践。

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文明形式。政治文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设施,如果只适用于某一国度,而不能为其他国度所借鉴,那么这样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设施还称不上政治文明。只有产生于一定国度同时又能为其他国家所借鉴的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才称得上是政治文明”<sup>[1]</sup>。政治文明又具有特殊性,每一种政治文明形式又因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程度、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等方面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当今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政治价值观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自由民主话语是一种全球性的宰制性话语,这给发展中国家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塑造带来深刻影响。

(一)自由民主价值观形成宰制性话语的过程

在当今世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文明

形式占据主导地位。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是西方普遍认可的政治价值内容。

从思想史的角度讲,自由的概念经历了诸多理论家的修饰、丰富与发展。洛克强调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宪政原则;边沁以功利主义为基础提出自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康德用‘普遍立法形式’、‘人是目的’等晦涩的道德语言表达了个人自由理想”<sup>[2]19</sup>;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学说;贡斯当区分了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斯图亚特·密尔则提出了意见表达自由的重要性。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新自由主义崛起。格林主张放弃国家对市场的放任自由,而应该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20世纪70年代以后,保守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展开批判,主张重新回归古典自由的核心价值。如哈耶克对计划经济进行了全面批判,同时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萨托利认为当今民主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自由的实现,而“损害自由的主要不是威权主义,而是平等主义”<sup>[2]45</sup>。

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在不同时代围绕“自由”这一核心,丰富发展了“自由”理论。尽管“自由”产生时的内涵与今天人们的理解有了一定的变化,但经过理论家们的发展最终使自由主义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终至成为宰制性的世界话语。

(二)自由民主政治价值观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辩

政治价值观是一个框架,可以装载不同的内容,一旦内容填充进去,它将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事物,也就有了内容迥异的政治价值观的表现形式,比如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专制的政治价值观、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等。

自由民主政治价值观作为一种特殊存在,在获得文化哲学的完整表述后,便具有了获得普遍权力的要求。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将自身的价值、意义甚至哲学领域里的特殊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强加于其他世界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也一样是特殊与普遍的矛盾统一。它因其特殊性而存在,同时内含着普遍性的要求。特殊性要求与普遍性要求的碰面会带来激烈的斗争。现实的情况是西方国家依靠强大的技术、资本、军事和制度的优势将自身的优势强加给其他世界,更为关键的是在道德和价值领域西方世界具有强大的

自我肯定的能力,而这一点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较弱。基于此,发展中国家政治价值观所具有的普遍性只能作为西方眼中的“特殊”被加以拒斥、否定。“这种价值领域的不平等,正是当代文化政治和文化认同的根源性问题。”<sup>[3]</sup>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塑造国家形象时处于两难困境的原因。

### (三) 自由民主语境下发展中国家塑造国家形象的两难困境

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普遍性话语,以先发优势、经济军事实力和完善的制度作保障,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巨大压力。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进行国家形象构建,发展中国家处于两难处境:其一,因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有自身独特的政治价值观,这些政治价值观又往往与它们自身的政治实践、历史传统紧密相连。完全照搬西方自由民主,用于本国未必能结出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果实来。这样做的副作用是忽视了自身政治价值观的独特性和历史延续性,造成历史的断裂。其二,倘若在发展的潮流面前,完全固守自身所谓的传统去抵御现代性的政治价值,自说自话,自身将变成普遍性话语中的异类。用自身的政治价值去对抗抵御普遍性话语,不仅力量不够也未必能够行得通。很多发展中国家不缺乏自身独特的政治价值,但是用来与普遍性的话语相抗衡,力量似乎不够,本国曲折的历史实践往往又成为对抗的包袱。这使得它们不能占据政治价值的道德制高点,况且,一些国家政治价值理论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自洽性尚存在问题,又怎能拿去对话甚至抗衡呢?因此,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宰制政治话语的包围和围剿,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坚守自身的主体性,展现出自身的民族自信、政治自信和理论自信,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价值,又不能对这个宰制性的世界政治话语置之不理,更没有能力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价值系统与之相抗衡。在此种情形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外要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的确很难。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基本上处于“被言说”的地位。这种“被言说”是指西方尤其是美国按照它自身的政治价值系统去解读、评判、衡量、裁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当这些国家以自身的政治价值观去“言说”自身的时候,西方国

家不会认同,因为这些国家自身的政治价值观与西方发达国家并不相符。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找到既适合本国政治发展又能兼容西方政治价值的论述系统和理论体系,就成为对外塑造自身形象的当务之急。对于中国来说,这点尤其重要。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在此得到进一步体现。

## 二、民族文化不同与国家形象

### (一) 民族文化价值取向与国家形象塑造

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对象国家的形象认知。不同的民族具有形态各异的民族文化形式,而不同形式的民族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些文化价值取向各异的民族文化作用于人们的认知系统,使人们面对同一事物、事件、行为等作出的判断和反应不同。

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对中国人的德性进行了详细描述。他认为,中国人的德性包含这样几点:“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保守性。”<sup>[4]</sup>而这样的“德性”内涵,与尊重个体价值、追求自我实现、永不满足地向前探索的西方人个性显然不同。这种差异会在受众评判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时产生作用。

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首先作用于人的认知系统,因此需要通过改变认知影响人的态度,进而改变人的行动。一个重视集体、较少重视个体差异的国家,会重点突出塑造自身的集体主义形象,这在重视个体差异的受众那里会受到激烈抵制;一个以人情、面子、关系等为关键词的文化所传递出的国家形象,在奉法治为圭臬的受众面前很难产生共鸣;一个以含蓄为美的民族所塑造的形象,在以开放为宗旨的受众那里会遇到障碍。一个尊崇礼尚往来的国家,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物质交换,而是提供相互依赖的基础和信任载体,但这样的行为在有的国家看来则是利益交换掩盖下的腐败。可见,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所带来的认知和交流障碍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和制约非常严重。

当然,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存在通约的可能性,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民族之间的隔阂不可穿越。相反,不同的文化之间应该沟通和交流,也只有这样,不同的民族之间才能不断了解,以消除相互之间的不确定

性。一个国家要想传递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必须对传播对象国的文化有足够、充分的了解,只有用对方的语言和文化来表达自身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发展中国家要传达和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穿越文化的障碍和隔阂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用并不占优势的民族文化去与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去抗衡。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塑造国家形象时必须面临的问题。

## (二) 刻板印象与国家形象塑造

刻板印象是信息接受对象对人或者事物过度简单、过度概括或夸张化的看法。它最突出的特征有三个:“以人或者事物最明显的特征加以归类、以一组特征涵括全体、以同一种方法对待所有的事物或人群。”<sup>[5]</sup>刻板印象进一步发展,就是文化偏见。偏见是超越认知的,属于态度层面,它能介入、引导人们的行动。因此,偏见是基于错误的看法所积累成的对待人和事物的僵化态度。

刻板印象和民族文化偏见有一套完整的认知判断机制。这一机制会深刻影响人们对某一国家形象的认识和判断。刻板印象从来源上说,它来自社会认同过程中的自我范畴化过程。影响自我范畴化的重要因素是社会情境,“不同的背景会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自我与他人进行范畴化,因而产生不同的刻板化感知、信念与行为”<sup>[6]75</sup>。

刻板印象有两种功能:一是个体功能,二是社会功能。就个体功能而言,它突出表现为认知功能和价值功能。刻板化的认知功能表现在它提供了一条认识事物的便捷途径,将复杂的世界在短时间内划分为简单明晰的不同领域,便于认知主体迅速作出判断。这时认知主体基于刻板化所作出的判断具有很强的价值倾向。一般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群内刻板印象通常是赞许性的,而群外刻板印象通常是贬义的和非赞许性的。”<sup>[6]7</sup>换言之,认知主体一般倾向于对群内作出积极的评价,而对群外的主体倾向于作出负面的评价。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 world 大国,GDP 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是自由化的改革,这与西方的经济没有本质差别。但在政治领域,中国与西方存在本质差异,西方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

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西方是多党轮流执政制度,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西方强调普遍意义上的“人权”,而中国在理解人权时首先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些诸多不同,越发使西方国家意识到所谓“中国模式”的存在,对立思维使其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特异性正在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侵蚀,西方国家的安全感受到威胁,由此他们经常拿出上述价值来强化自身的自我中心地位。西方国家向中国挥舞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棒,一方面体现了政治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也是西方我群中心主义意识实施自我保护的表现。

对某一民族刻板印象的极端化就演变为民族文化偏见。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存在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偏见。萨义德认为,19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所认为的东方社会没有真实根据,它是根据西方人的文化、政治建构出来的,是西方人想象的东方。现在的东方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人在内)虽然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这种东方主义“幻影”的存在,但自身采取的措施不是去反制和改变,相反却选择顺从,在有意无意地“自我东方主义”化。这里所谓的“自我东方主义”是指东方人按照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来建构自身的东方形象。云南藏区的中甸更名香格里拉——西方想象的名号,正是迎合西方喜好和想象的一个例证。正如汪晖所描述的:“2004 年,我在中甸一带访问时,曾经到过—一个藏族文化的‘样板村’,这个小小村落竟然网络了几乎所有藏族文化的建筑和摆设,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何曾有过这样一个西藏的文化村?关系与西藏的神秘主义想象现在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标志,那些从全世界和全中国奔赴藏区的旅游大军,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创造的各种‘本土的’、‘民族的’文化展品,究竟在创造怎样的新东方主义‘神智论’和通灵术?”<sup>[7]</sup>各国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民族国家框架下民族间的文化偏见等诸多因素综合起来,构成一个强大、无形的文化屏障。这种文化屏障通过作用于人的认知系统,制约传播对象国受众对传播主体国家形象的态度和行为。

## 三、简单的结语

在现实的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中,政治价值观和民族文化作为两个最为重要的中观因素并不是单独在起作用,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政治价

价值观的冲突往往表现的更为直接,而民族文化的差异则隐藏在政治的背后或者人们的思维方式中间接地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动。

总之,作为民族国家间差异的两个主要因素同时也作为中观因素——政治价值观和民族文化——与微观的国家理念,宏观的不平等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等因素一起,构筑、形塑和影响着国家形象及其传播。只有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察,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才有可能。

#### 参考文献:

[1] 虞崇胜. 政治文明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193.

- [2] 徐大同. 现代西方政治思潮[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3] 张旭东.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3.
- [4] 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M]. 南京: 凤凰出版集团, 2010: 48.
- [5] 陈国明.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50.
- [6] [澳] 豪格, [英] 阿布拉姆斯. 社会认同过程[M]. 高明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7] 汪晖. 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06.

[责任编辑: 张莲英]

# 多元共识社会中中国政治传播的转型思路

苏 颖

(中国传媒大学 政治传播研究所, 北京 100024)

**摘 要:** 政治传播是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渠道之一。当前中国社会呈现出政治价值的多元化与左右分化的趋势, 并且在新媒体搭建的场域中, 知识精英层的论争逐渐成为普通民众关注的话题, 这些对中国政治传播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政治传播应该适应社会变革, 寻求新的支持途径: 引入民意调查的相关技术, 提高谋求特定支持的能力, 调整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提高谋求散布性支持的能力, 从而实现中国政治传播由单一的国家主导寻求统一共识向通过国家与社会的沟通寻求多元共识的转型, 以此支持多元共识社会中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 政治传播; 多元共识; 国家与社会; 中国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1971(2013)02 - 0036 - 04

在当前的中国, 社会价值观的不断多元化, 势必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产生一定的张力。在这样的现状之下, 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同的话语如何实现沟通? 中国当下的社会是否会产生分化? 这样的社会如何保证发展的稳定性? 政治传播在其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以上问题是本文思考的起点。中国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发生了许多关键性变革,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必须厘清这些变化, 才能根据时代的脚步, 重新调整其发展方向及转型策略。

## 一、政治传播、共识、多元共识

### (一) 政治传播

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聚焦于政府与媒介的互动关系, 且主要应用于政治竞选领域。除此之外, 还有沿袭多伊奇、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从结构—功能视角对政治传播展开的研究, 而这也是政治传播研究的理论源流之一。笔者认为, 从这一视角出发更能理解中国的政治传播, 因为组织内的政治传播——以会议、文件等为载体在组织内部层层

收稿日期: 2012 - 12 - 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11&ZD075)

作者简介: 苏颖(1986—), 女, 湖南益阳人, 博士研究生, 从事政治传播、国家与社会的沟通研究。